

京師大讲堂  
JINGSHI DAJIANGTANG

# 精神瑰宝：

周桂钿儒学讲义

JINGSHEN GUIBAO

周桂钿◎著▶



NLIC 2970672253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師大讲堂

JINGSHI DAJIANGTANG

副标题：京师一脉的学术风范、义理学派的学术精髓、治学经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精神瑰宝：

## 周桂钿儒学讲义

JINGSHEN GUIBAO

周桂钿◎著 ▶



NLIC 2970672253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精神瑰宝：周桂钿儒学讲义 / 周桂钿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9  
(京师大讲堂)  
ISBN 978-7-303-11348-4

I . ①精… II . ①周… III . ①儒学—研究 IV . ①B222.05

---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0020 号

---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 子 信 箱 beishida168@126.com

---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http://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 mm × 235 mm  
印 张：15  
字 数：201 千字  
版 次：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00 元

---

策划编辑：饶 涛 谢雯萍 责任编辑：谢雯萍  
美术编辑：毛 佳 装帧设计：李 尘  
责任校对：李 菁 责任印制：李 喻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 从王充到儒学

## ——我的学术历程（代序）

### 一、我与王充有缘

我的学术历程是从研究王充哲学思想开始的。

1961年8月，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到玉田镇大生春百货店的售书柜台那里买了一本只有81页的小册子——《王充——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这是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曾任苏联驻华大使阿·彼得洛夫著、李时译的学术专著。现在想不起来那时为什么买这本书，也根本不知道内容是什么，更不知道这么一个农村小书店怎么会卖这一类学术著作。没想到，这本书居然与我未来的研究历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1964年，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将许多存书留在老家，有的送给一些同学，将这一本著作带到了北京。到北京以后，我又买了一些书，如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古代散文选》等，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本本都不见了。后来我到河北邯郸下乡插队，任中学和大学教师，

又散失了一部分。十年动乱，走南闯北，奇怪的是，就是这一本书一直保留到现在，它伴随我经历了四十多个春秋！

20世纪70年代，全国掀起批儒评法运动。书店除了红宝书，又增加了一些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是法家的著作。我当时花了不到两元钱买到两本书：《论衡》和《荀子》。当时，荀子和王充都被定为法家代表人物。时间多而书少，我就细读这两本书，逐渐地对王充的《论衡》产生了兴趣。读了几年，自然有一些体会，在辅导全县中学教师学习儒法斗争时，还可以讲一些自己的看法。王充被封为“法家”，主要由于《论衡》中有《问孔》《刺孟》两篇，被认为是向儒家的大圣人与亚圣公开挑战。而韩非是最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论衡》在《问孔》《刺孟》两篇之间，还插入一篇《非韩》，许多研究儒法斗争的人却视而不见。我通读《论衡》还发现，王充对孔子相当推崇，问孔，不是反对孔子，而是反对汉儒将孔子神化。后来，我考上研究生，入学三个月，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王充反孔吗？》这篇文章的观点在我考上研究生之前就已经形成。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上本科，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一定的理论思维训练。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利用停课时间通读了《资治通鉴》，了解历史，同时学习了古汉语，再加上批儒评法时期对“法家”著作的阅读，恢复高考以后，我考研究生就选择了中国哲学史专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刚上一个学期，导师就要求大家确定研究方向。我决定研究《论衡》，导师是钟肇鹏先生。

我第一本专著就是我的硕士论文《王充哲学思想新探》（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出版），书中只有“三论”：天论、气论、知论。天论研究的是王充哲学与汉代天文学的具体联系；气论分析王充气的思想，否定气或元气一元论的说法，提出王充哲学是天地本原论的新观点；知论发现王充“知为力”的思想，肯定知识的力量，比西方培根早一千多年。李保平同志当时刚到出版社，接的第一本就是我的这本书稿。后来他当了河北人民出版社社长，我又有两本重要的专著在该社出版，加上我曾在河北工作八年，说明我与河北

有缘。

王充丰富的思想，“三论”是概括不了的。当我正想扩充的时候，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约我写《王充评传》，我马上应允。花了一年多时间，从“三论”扩充到“十论”，增加了七论：形神论、性命论、适偶论、政论、贤佞论、儒论、文论；又增加了两考：王充生平考和著作考。这就比较全面了。不久，人民出版社编辑王粤约我写《中国大哲学家研究系列·王充》。前面已经写了两本，再写，写什么？已经有了十论，再加两三论，也不好算是新著呀！必须打破原来的体系！超越自己，那是十分困难的。我曾经为此思考了整整一年！有一天，王粤见到我，问起书稿的事，我说还没有动笔，她说：“还有你这么不着急的人，时间都过了一年呀！”她的体会，人民出版社一旦向谁约稿，作者一般都会抓紧撰写的。但我不是不抓紧，只是我想给人民出版社的书稿必须是精品，实在有难度。当时，我告诉她，虽然没动笔，但已经考虑好了，写也就比较快了。过了几个月，我就拿出初稿。她审读以后，提些意见，我又作些修改，很快就定稿出书。这就是我撰写的关于王充哲学的第三本专著：《虚实之辨》（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经过研究，我对王充的哲学进行了归纳，概括出“疾虚妄”而“归实诚”，就是“虚实之辨”。从《论衡》的大量资料中，提炼出这一观点，完成了我对王充哲学研究的成果。我不会再写第四本了，但不是说王充哲学已经研究完了。实际上，所有哲学问题的研究，都不会有最后结论的，都是可以不断争论下去的，研究是没有尽头的。我也还有一些关于王充的研究文章发表，例如《王充哲学与东汉社会》一文就刊登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上。

有一天，两位日本学者来访。他们送我著作，我也把《虚实之辨》送给他们各一本。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却带出一个不太平常的事情。两位学者中有一位是京都大学的池田秀三先生，当时他是副教授，后来当了教授，聘我为京都大学客座教授。由于《论衡》的牵线搭桥，我到日本京都大学当了九个月的客座教授。在那里，我发现京都大学前辈学者很多是研究先秦与秦汉哲学的，也很重视

研究王充哲学。我在《王充哲学思想新探》一书中引了日本学者重泽俊郎的话，而重泽俊郎正是京都学派的重要人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占据重要地位。

我与《论衡》有缘，与之打了四十多年的交道。我从《论衡》走上学术之路，出了一批成果，也因此被破格提为副教授，评上教授、博士生导师，又将我的研究与日本学者联系起来，使我有机会到日本中国学研究重镇、京都学派的根据地——京都大学宣讲《秦汉哲学》（讲义修改后，已由武汉出版社出版）。

我的研究不停留在《论衡》上。从王充哲学与汉代天文学的关系，过渡到中国古代天文学，又由于天人关系，从天文学过渡到医学，再到中国传统科学。这是一条线，是从王充哲学到求真的科学哲学。另一条线，由于王充与董仲舒的关系，过渡到研究董仲舒哲学，再到秦汉哲学，到中国传统的求善的政治哲学。再加上庄子求美的艺术哲学，组成中国传统的追求真善美的哲学体系。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是求善的政治哲学，西方主流是求真的科学哲学，这是东西方哲学最大的差别。这一切，毕竟是从《论衡》起步的。总之，我与王充有缘，研究王充《论衡》是我的学术生涯的起点。

## 二、探索天地奥秘

我在研究王充哲学时，王充《论衡》中讲到天的地方很多，别人评论王充时，也经常提到天的问题，这就遇到一个问题：天究竟是什么？这是谁都知道的最通俗不过的，我却不清楚。我就找到一本《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读了以后，有了一些了解，但还有许多问题不明白。我向老先生打听，知道该书作者陈遵妫先生是北京天文馆馆长。于是，我就到天文馆找到陈先生，一见面，说话，原来他是福州人，我们还可以用福州话交谈，很亲切，也很融洽，好像“他乡遇故知”，双方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当时，我住在妻子的单位——七机部（即后来的航天部，现在又改名航天局，部直机关在马神庙），陈先生住在离北京天文馆不远的二里沟。我到陈先生家，骑自行车只要十多分钟。我差不多每周去一趟。他耐心地给我解答问题，还送给我一些从全国征集来的、从地方志中抄录的天文资料。

有一天，陈先生告诉我，他准备撰写一大部新书，将原来的书名去掉两个词：“古代”“简”，要写《中国天文学史》。我问他有多分量，他说大约二百万字。已经八十岁的老人还有这样的气魄，真了不起！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跟我提到这本书，明确提出让我撰写其中一章《古人论天》。我答应了，这是我学习天文学的一个机会。我认真写，不懂就问，弄清楚了过去似懂非懂的一些内容。写成初稿约五万字。交稿后，有一天陈先生告诉我，我起草的部分由于哲学味太浓，被他的助手删节了一些。《中国天文学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册1980年8月出版，第二册1982年8月出版，第三册1984年11月出版。按这种速度，第四册到1986年就可以出齐。结果第四册到1989年才出版。出齐以后，我才看到我撰写的《古人论天》在第四册的第九编。但是，却看不到我的名字，到了后面才发现在第五章注一提到我。前几章，我的研究成果，都与我无关。后来我又继续研究天文学的问题，写出十万字的初稿，交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提了一些意见，要求增加内容，在多次修改后，成为三十多万字的专著《天地奥秘的探索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这本书是向陈遵妫先生学习中国天文学的习作，也是在帮助陈先生撰写《古人论天》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现在来看《古人论天》那一编，我也觉得哲学味太浓，都是我那时的哲学语言。后来我应邀参加一套丛书的编写，又撰写《中国古人论天》，以通俗的语言将我的研究成果介绍给读者。也就是说，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学，我写了两本书，一本学术著作，一本通俗读物。

学术著作的成果值得介绍一下。这一本专著每一章都有自己的观点，或者发现新资料，或者提出新看法，纠正前人的看法也很多。主要的有以下几项：

第一，关于浑天说探源。前人权威的说法，以现在是院士的席泽宗为代表，外国以李约瑟为代表，都认为浑天说产生于战国时代，前者更明确地说是慎到的创造。我通过对《慎子》一书的考证，找出错误的来龙去脉。这是花了大工夫的，也是自己的得意之作。

第二，我对汉代论天三家都作了新的研究和评价。浑天说假设天像鸡蛋壳，相当于现在的球面天文学，有很多合理性，对历法贡献最大。张衡能用水动浑天仪的实验证明自己的假设，能预测日食与月食。在一千多年中，浑天说在中国天文学和历法界占统治地位。盖天说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天说，认为天像车盖，地像棋盘。它有一个七衡图，能解释二十四节气的变化，明确提出，北极地区一年六个月看见太阳，六个月不见太阳，夏天还有不会融化的冰；赤道地区冬天草不会枯萎，还生长着夏季的植物。盖天说还认为世界各地的昼夜是不一致的：东边是傍晚，南面就是中午，西方是早晨，北方是半夜。这叫“昼夜易处”。这就是现在说的时区理论。关于宣夜说，因为到汉末就绝无师法，没有人继承了。它认为天既不是车盖，也没有像鸡蛋那样的硬壳，只有一片茫茫无边的气。它虽被天文学家所抛弃，却被哲学家所采纳。后来也受到英国现代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的充分肯定，认为这比西方同时代的任何天文学都毫不逊色。

第三，还有一些具体的发现。例如风的级别，西方以英国科学家蒲福名字命名的蒲福风分为十二级，中国《观象玩占》分十级。《观象玩占》收入《古今图书集成》，这部中国最大的类书出版时间比蒲福出生还要早几十年。这一事实说明风级的知识产权应该是中国的，而不是英国的。

第四，公元15世纪，朝鲜用青铜制造了测雨器。这个测雨器上有汉字“测雨台”和“乾隆庚寅五月”字样。有的人就说是中国造的，有“乾隆”为证，说是清朝时制造送给朝鲜的。但是，一查史书，清朝没有制造测雨器的记载，用汉字和乾隆年号都是当时朝鲜使用汉字与清朝年号的实际情况。另外，朝鲜《李朝实录》明确记载：“英宗四十六年庚寅……造测雨器”。

第五，对“两小儿辩日”作了详细解说。其中的复杂性，只有研究过的人才能理解。这个问题外行以为很简单，实际上是世界性的至今尚未解决的难题。这个问题至少涉及天文、数学、物理、生物、医学诸学科。

研究中国天文学以后，读古代哲学著作，发现许多哲学家都要谈到天地问题。我曾经想撰写中国古代哲学家论天，后来只写了《柳宗元天论研究》，参加柳州柳宗元学术讨论会，被《中国社会科学》的编辑选上，刊登在该刊的1984年第3期上。我也研究过王廷相、王夫之、王锡阐等人的天文学思想。朱熹虽然也谈天文学，水平不高，有些研究朱熹思想的人也涉及天文学的内容，有许多外行话。我也曾针对那些错误，专门写了《朱熹的宇宙论与天文观》，发表在《福建论坛》1991年第5期上。

《天地奥秘的探索历程》是一本天文学与哲学结合的著作，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将它放在理科的天文学类里，而不是放在文科的哲学类中。这一本书，我下的工夫很大，在学术界的影响却不大。有一天，我去拜访我校著名数学教授白尚恕先生，并送给他《天地奥秘的探索历程》。他说已经从书店买了这本书。哲学界的人对中国传统科学不熟悉，也没兴趣。天文学界对于外行的作品也不太关注。哲学界只有刘文英先生在《哲学研究》上发表过一篇书评。天文学界的薄树人先生曾经表示要看这本书，我已经买不到了。后来，他告诉我已经找到，还没有听到他的批评，却得到他逝世的噩耗。白尚恕、薄树人与刘文英都已先后仙逝。此书的知音太少了。我送这本书给张岱年先生时，他建议我研究《人体奥秘的探索历程》作为此书的姐妹篇。我重视这个建议，买了一批中医的典籍。看来看去，感觉难度比前者更大，时过十八年，只写过几篇文章发表，未能成书。这是未了的心愿。最近成立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作为中国哲学史学会分支机构，我是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参加了成立会议。这将促进我与中医界的交流。

### 三、三次定性董学

研究王充之后，我就开始研究董仲舒的哲学。我在研究董仲舒哲学的过程中，给董仲舒哲学的定性产生过三次改变，就是三次定性董学。定性的变化，说明研究的深入，思想的提高。

第一次定性：研究王充哲学时，给董仲舒哲学定性为唯心主义。学术界关于王充与董仲舒关系的论著，都是说董仲舒提倡天人感应，

王充反对天人感应，因此，他们是针锋相对的。多是人云亦云，没有认真细读《春秋繁露》与《论衡》，更没有全面深入地研究王充与董仲舒的思想。王充批评的天人感应多是儒家经传中或其他论著中的说法，涉及董仲舒的只有土龙致雨一节。其他多是肯定的、赞扬的。我研究王充哲学的时候，还时常将董仲舒天人感应说作为王充反对天人感应说的对立面，摆在唯心主义地位上。根据王充《论衡》中 62 次提到董仲舒，看不出王充与董仲舒针锋相对，却看到王充对董仲舒的高度赞扬，即使是批评，也是比较客气的。

第二次定性：研究董仲舒哲学时，给董学定性为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唯物的。1985 年，通过张岱年先生、钟肇鹏先生和任家麟先生的推荐，我获得美国王安研究院汉学奖助金。获得这项首届奖助金，中国大陆有十一人，北京师范大学有林崇德先生和我。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我又用了两年时间专心研究董仲舒思想。首先，通读《春秋繁露》，研究董仲舒哲学。其次，翻阅过去发表的关于董仲舒的论文，还请我的研究生同学又是好朋友的张永明同志到北京图书馆给我复印一些资料，最后，在综合古今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研究，写成《董学探微》。启功先生题签，张岱年先生写序，河北枣强县文化馆馆长步进同志提供董仲舒石像照片，都为本书增色不少。本书对董仲舒生平事迹作一考证，主要考证他的出生之年和故里，对策之年与任相经历。此书出版后，学术界也有一些不同的议论，但没见特别有力的反证。倒是有一位外国女学者，汉名桂思卓，向我提出了让我震惊的意见，她说董仲舒的菜园可能不在他的老家故里景县，似乎应该在京都长安。理由是：五十多岁的董仲舒已经是景帝时代的博士，怎么能还在家乡？我深感她看书认真，思考仔细。后来我再研究一番，觉得董仲舒的菜园在长安更合理一些。专门写了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董子菜园在何处？》发表在《学术界》2003 年第 6 期上。董仲舒哲学是从当时社会现实出发，最后还是归结到社会现实。他的哲学体系用天人感应形式来论述，内容是为当时的社会政治服务的，有明确的针对性。因此，我用了“形式是唯心的，内容

是唯物的”来定性董仲舒哲学。虽然我仍然肯定董仲舒哲学是唯心主义的，但也像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黑格尔哲学的评价那样，肯定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包含唯物主义的成分和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虽然在研究过程中尽量使用中国哲学原有的概念和范畴，但还是没有脱离用两个对子来研究中国哲学的旧理路。

《董学探微》认为，董仲舒哲学是以“大一统论”为中心，以“天人感应”和“独尊儒术”为重要两翼。充分肯定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辩证法思想，不赞成根据“天不变道亦不变”一句话就将它定性为“形而上学”。

在《董学探微》出版之前，我参加了钟肇鹏先生主持的《春秋繁露》校释工作。在校释中，获得很多儒家典籍资料整理的知识和经验，这对研究董仲舒思想有很大帮助。

从中国思想史上看，对中国社会政治整体影响最大的特级思想家只有三位：一位是孔子，他的影响无与伦比。另一位是董仲舒，他提出独尊儒术，奠定了儒学独尊的地位。他提出的天人感应论，直至明清时代还有天坛，皇帝每年春正月上辛日还要恭恭敬敬地到天坛祭天，祈求上天赐予“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他提出的大一统论，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对维持中国大国统一的政治局面有重大影响。再一位就是朱熹，他的理学发展了儒学，他的《四书集注》成为封建后期八百多年知识分子的必读书。在两千五百年中，孔子影响了两千五百年，董仲舒影响了从汉朝到清朝的两千多年，朱熹影响了最后八百年。他们的思想还在影响着中国与世界。

第三次定性：是在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以后，发现中国传统哲学主流是研究政治哲学。董仲舒哲学就是典型代表。在研究了王充哲学与董仲舒哲学的基础上，我研究了汉代的天文学与医学，也研究了汉代的经济学与史学，还研究了汉代许多思想家，包括王莽等人，最后汇编成《秦汉思想史》。在很多人讨论中西文化差异的时候，在讨论中国有没有哲学的时候，在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时候，都让我感到困惑，百思不得其解。徐复观先生的一本书《中国艺术精神》启发了我，他认为庄子的道就是中国艺术精神，修

道就是培养艺术精神。王充是近代科学精神的超前觉醒者，是求真的科学哲学；庄子是求美的艺术哲学，那么董仲舒与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这些主流派哲学家，就都是求善的政治哲学家。这样，我就把哲学分为三大类：求真的科学哲学、求善的政治哲学与求美的艺术哲学。这就是我第三次将董仲舒哲学定性在求善的政治哲学上。科学哲学探讨宇宙本原，因此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政治哲学探讨的是社会治乱问题，只有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开放与封闭的区别，不存在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董仲舒哲学是求善的政治哲学，因此不能用唯心主义来定性。秦汉时代是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封建制度是最先进的制度，地主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董仲舒哲学代表地主阶级，为封建制度服务，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过去对董仲舒哲学的批评，多是由于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也缺乏历史辩证法的思维能力。第三次定性是在我研究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才作出的，那是我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成果。

学者改变自己以前的观点，有的迫于形势的压力，有的出于利益的考虑，更多的是由于认识的提高、思想的进步。认识的提高、思想的进步，都是有根据的，有原因的，有线索可寻的。这是可信的、正常的。勇于修正自己的观点，是应该提倡的。

#### 四、褒贬《庄子》阐微

上大学时，我就知道庄子是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家，是反面人物。1979年，在太原召开改革开放后第一次中国哲学史大会。在那次会上，我与冯契先生在一个小组。冯先生在小组会上发言时说自己非常喜欢庄子，给《辞海》写“庄子”词条时想写一句肯定的话，却没有写上。当时我很吃惊，为什么大哲学家会喜欢这样在当时被视为一无是处的唯心主义哲学？既然喜欢，又为什么写不上一句肯定的话？有一次，我与张岱年先生议论庄子，张岱年先生说：“庄子提出的问题多而且深刻，是汉代以后所不及的。”后来，我看到鲁迅、闻一多、顾颉刚等许多名家都对庄子哲学评价甚高，都认为他是先秦时代学术水平最高的代表。鲁迅说：“晚周诸子之作，莫

能先也。”顾颉刚说：“《庄子》是战国时代最高的哲学代表。”闻一多认为自己崇拜庄子超过所有其他圣贤，达到疯狂的程度。但是，全国流行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中都是将庄子作为反面的角色，说他的宇宙观是唯心主义的，方法论是相对论的，认识论是不可知论的，人生观是悲观厌世的，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对于庄子的评价，高水平的思想家与我们通行的教材，为什么会如此悬殊？如何解释这种差异？我苦苦思索了几年，认为是由于东西方哲学模式不同，根据西方哲学的模式剪裁中国哲学，破坏了中国哲学的完整性。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褒贬〈庄子〉议》发表在《法言》（香港）1990年4月号上。文章中说：“胡适在20世纪初用西方的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后来，西方哲学方法逐渐变成僵化的模式，勉强套在中国哲学上，产生了四大块（宇宙观、方法论、历史观、认识论）模式。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思想，都用四大块去套，结果使《庄子》这样一个有丰富思想的哲学体系经按四大块模式剪裁以后，变成了一堆废料。”“如果反过来，用中国哲学模式来评论西方哲学，那么，西方哲学有的是清谈家的纸上谈兵，有的则是唯智能的偏知陋见，很少能纳入‘融汇天人，贯通古今’的中国哲学，所以大多是不合格的。我不是反对借鉴西方哲学，也不反对用西方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我认为引进西方哲学，是能够促进中国哲学的发展的。反对的只是将西方哲学方法变成僵化的模式，来全盘否定中国哲学，阻碍中国哲学的发展。这种思路正是《庄子》哲学被全盘否定的一个主要原因。这说明用西方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时要充分注意到中国哲学的特色。”

庄子是中国古代突出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这是包括冯友兰在内的哲学界的共识。从1949年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我所看到的中国哲学史教材和有关论著，全部都是将庄子放在唯心主义的阵营里。只有寓居香港的新儒家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认为庄子哲学中的“道”，就是艺术精神，对后代的书法、中国绘画等产生巨大的影响。徐复观的说法给我很大启发，对《褒贬〈庄子〉议》一文加以补充，扩展成长篇《庄子新论》（刊登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办

的《哲学门》第2期上)系统阐述自己对《庄子》的研究成果。我认为庄子哲学是求美的艺术哲学，不是求真的科学哲学，不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问题，只有美丑、雅俗的分别。

发现对《庄子》的评价如此悬殊，就算发现了问题。对于研究哲学的人来说，发现问题就是重大收获。能够正确提出问题，就等于解决了问题的一半。

如何解释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思维模式的不同，企图以此来解释这种现象。这也是听了王树人教授的谈话得到的启示。他说，他到德国当高级访问学者，回国后，就画了一幅自己比较满意的中国画，裱好后，托人送给德国那位指导他的教授，以表感谢之意。过了两年，他再次出访德国，难免要去看望那位尊敬的导师。到他家见到自己的画，大吃一惊，画被剪去上下，只留中间部分镶嵌在玻璃框中。中国画里的空白所表现的美学韵味，完全失去了。同样道理，中国的庄子哲学，由于用西方的理论模式裁剪以后，深刻的、有特色的哲学韵味也丧失了。所以，高水平的庄子哲学完全被破坏了，精髓不见了，只剩下一些零散的残片。一般人无法从中体会出美学韵味，也像普通人不会从出土的秦砖汉瓦的碎片中发现什么考古的价值。现在日本《京都新闻》每天刊登一个汉字书法，并加以讲解，经常是讲某一划在这个汉字中所表现的特殊韵味。讲解者水平很高，但实际上一幅书法作品，是一个整体艺术形象，抽出一个字，虽然是完整的一个字，已经没有了那幅字的整体艺术形象。如果将汉字的一笔一画取出来，脱离整个汉字，进行欣赏，那当然就更差了。即使是从书圣的神品中取出一划来，也许观众不以为是汉字，那还有什么艺术价值？拳王身价是很贵的，但是，切取拳王的一根手指头，恐怕卖不出什么高价钱。一个玉雕的送水观音，价值百万元。如果送水的那个花瓶缺了口，价值要降一半以上，而那个掉下来的瓶口碎片恐怕也卖不了多少钱。为什么呀？这就是艺术品的价格规律。对于一个思想家或哲学家的思想体系，也是这样，虽然某一点思想片段对某些人可能产生启发，但不能充分体现整个思想体系的价值。因此，有些研究者总喜欢从思想家的著作中摘出

几句话，一知半解，就给出定性的结论：这是唯物主义的，那是唯心主义的；这是辩证法的，那是形而上学的。这是不恰当的治学路子，得出的结论也不可能可靠、令人信服的。

日本京都学派的中国哲学研究者小岛佑马认为，从中国古籍中找出一些与西方哲学相类似的语言，然后拼凑成中国哲学，这样研究中国哲学不是好思路。因为这样会破坏中国思想体系的完整性，使人难以把握中国思想的精髓。但是，小岛佑马认为中国只有“思想”，没有西方那种“哲学”。因此，他给学生开的课是“思想史”，而不是“哲学史”，他所著的论文，在他逝世后汇编成书，其书名题作《中国的社会思想》（1967年）和《中国思想史》（1968年）。他没有将这“思想”也看做是一种“哲学”。过了十年以后，在1977年，他的学生坂出祥伸在回顾日本的中国哲学确立的时候，认为小岛佑马起了关键的作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97年，坂出祥伸教授在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主办的“20世纪国际汉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国际研讨会上所发表的学术报告，重新提出这种观点。日本的东洋学、中国学、中国哲学，都有小岛佑马的身影。这些“学”的创立过程，都有小岛佑马的贡献。在这里，坂出祥伸教授认为小岛佑马先生所说的中国思想，就是中国哲学，只是不同于西方的那种重视自然、研究自然的哲学，是重视社会、研究社会的哲学。我把这种研究社会的哲学称为政治哲学。

总之，庄子哲学是求美的艺术哲学，是深刻的、有很高价值的。但用西方哲学模式来裁剪，就成为一无是处的思想碎片，失去价值。这很有代表性，说明用西方哲学模式来研究中国哲学时是有过教训的，需要注意中国哲学的特点。同样，在管理、社会、心理、教育、科学、数学、医学诸领域的研究，都应以此为戒。

## 五、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热烈讨论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总结出许多点，有的十条，有的八条，有的分析得很细，有的概括得很精，五花八门，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些内容大概是各家公认的，如说中国是综合的，西方是分析的；中国是模糊的，西

方是精确的；中国是宏观的，西方是微观的；中国重伦理道德，西方重科学知识；中国重视整体，西方重视个体；中国强调个人服从国家，西方强调个性自由解放；中国重视家庭观念、讲孝，西方主张个人主义、不讲孝；中国尊敬老人，主张尊老爱幼，西方特别是美国，爱幼不尊老，是儿童的天堂，是老人的坟场……

1991年，我应町田三郎教授的邀请，到日本九州大学讲学，讲的题目就是《中国哲学之我见》（发表于九州大学1991年10月《中国哲学论文集》）。当时我讲了中国哲学的一些特点，就是根据当时流行的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说法，说中国哲学是丰富的、深刻的、模糊的、综合的、整体的、宏观的等，说这些特点还是无法说明中国哲学的体系或者模式与西方有什么不同，因为西方哲学也是丰富的、深刻的。西方哲学比较重视研究自然现象，强调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来为人类造福。中国哲学比较重视社会现象，研究人际关系，为治国平天下服务。前者与自然科学结合，后者与社会科学结合。哲学应该是两者的概括与总结，因此可以说，中西哲学各自有所偏重。重视什么，还是没有说出“模式”来。认识到中西哲学的不同，还概括不出模式，还没有真正指出体系不同的实质。

这个时候，我又经常听到关于中国有没有哲学的争论。学了西方哲学的人经常说中国没有哲学。但是，胡适与冯友兰不都是从西方学了哲学历来的哲学名家吗？他们都写出了《中国哲学史》之类的著作，如果中国没有哲学，他们写什么《中国哲学史》呢？西方哲学是哲学，东方哲学也是哲学。

我们过去学习的哲学定义是：“哲学是世界观的学问。”“哲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所谓世界观，就是对世界的总看法，是综合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理论体系。不过当时讲的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别的哲学体系并不都是这样的。胡适说：“哲学的定义从来没有一定的。”他给哲学下的定义是：“凡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